

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

——基于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方法的分析

单德朋

(1.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2. 三亚学院 旅业管理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22)

摘要: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 分析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贫困减缓之间的理论关系, 并利用 2000~2010 年西部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 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起积极作用, 并且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部门结构和劳动力密集程度能够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影响,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较大, 第二产业的作用较小。未来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在于, 一方面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速, 另一方面着力提升经济发展对本地贫困人口的包容性, 在提升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深度和广度的同时, 降低参与成本。

关键词: 西部地区; 产业结构; 贫困减缓; 劳动密集度; 贫困人口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30(2012)06-0106-07

一、引言

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历史原因, 西部地区历来是我国贫困减缓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在。自 1986 年国务院扶贫办成立以来, 我国各项反贫困政策均将西部地区作为重点瞄准区域。随着“贫困县政策”、“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以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等的实施, 西部地区贫困现象得到了极大缓解。2000~2010 年, 西部农村和城镇贫困者年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7.6% 和 7.2%。但从横向比较来看, 西部地区减贫形势依然严峻, 因灾因病返贫人口依然较多, 返贫率较高; 其贫困深度和广度均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并且西部地区过去的贫困减缓对政策性扶贫、转移支付的倚重较大。在经济增长减贫效应趋于下降的背景下, 西部地区有陷入“慢性贫困”的风险。如何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减贫, 完成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是西部地区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面临的艰巨任务。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在于过去的被动扶贫亟须转向基于自我发展能

收稿日期: 2012-08-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形势下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09&ZD011); 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国际旅游岛背景下海南民族地区包容性增长机制研究”(Hjsk2012-67); 中央高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海南民族地区包容性增长机制研究”(11ZYXS12); 三亚市院地合作项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贫困减缓研究”(2012YD55);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一级学科建设项目(2011XWD-B0304)

作者简介: 单德朋(1985—), 男, 山东济南人,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三亚学院旅业管理学院讲师。

力提升的主动减贫,这一方面需要加大西部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等的投入力度,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包容度,增加贫困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和劳动密集度两个方面来分析经济增长包容度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影响,并寻找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路径。

现有文献对影响贫困减缓的因素进行了多角度研究,识别出的因素主要有: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广泛公平的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和公共支出的倾斜、完善的基础设施、地理资本的改善、金融发展等,从产业构成角度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从国外研究来看,产业构成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Montalvo 在分析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多样性效果时,认为经济结构独立于总体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产生影响^[1]。另有实证研究表明,经济结构所表示的初始不平等是影响经济增长减贫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2]。但现有研究对于各部门在贫困减缓中的作用却有不同的看法。Thorbecke 和 Jung 估计了印度尼西亚不同经济活动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认为农业和服务业的贡献要比工业部门的减贫贡献更大^[3]。Ravallion 和 Chen 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发现在贫困减缓效果上,农业的重要性要远超过其他非农产业^[4]。而 Hasan 和 Quibria 则认为工业是东亚贫困减缓的主要动力来源,而在拉丁美洲则是第三产业的减贫效果最为显著^[5]。除了各部门减贫效果不同之外,在同一地区减贫效果还存在城乡差异。Datt 和 Ravallion 研究发现,在印度农村地区农业对贫困减缓的效果最为显著,而在城市地区则是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更多地推动了减贫进程。

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关系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西部地区的研究不够,只有张萃等基于中国整体进行了实证分析^[6]。从现有研究来看,产业结构的确能够对贫困减缓产生影响,但对两者关系的成因分析不足。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只是一种结果表现,其根源在于不同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不同。因此,在分析过程中不仅要识别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而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劳动密集度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并且现有研究在实证过程中没有考虑贫困减缓的跨时期相关性,这将导致参数估计不一致。贫困的跨期相关体现为两种可能:一方面,现有贫困群体可能陷入慢性贫困陷阱,过去贫困的人口在当期贫困的可能性较大,即贫困存在不流动性;另一方面,贫困广度较大的地区,减贫政策的边际效果可能更为显著,即贫困存在收敛性。实证研究中需要对此进行处理,为此本文在现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并用系统广义矩(SYS-GMM)方法对动态模型进行了估计。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从劳动密集度角度分析了产业结构影响贫困减缓的深层次原因;第二,实证分析过程中,构建动态模型,考虑了贫困的跨期相关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贫困分解为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在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同时,甄别了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影响贫困减缓的城乡差异。

二、理论分析框架及计量模型设定

(一)理论分析框架

1. 背景假设

假设经济体中存在两个群体:贫困者和资本拥有者。只有资本拥有者拥有资本,并且资本存在代际转移,贫困者只拥有劳动力,故贫困者的收入和消费只取决于真实工资率。虽然该假定为强假定,但有助于在保留现实特征的前提下简化分析过程,且该强假定与现实中贫困者低储蓄率的事实一致,因此劳动力收入提升有助于贫困减缓。

最终产品 Y 是两种中间产品 y_1 和 y_2 的不变替代弹性函数(CES),表示为:

$$Y = (b_1 y_1^\beta + b_2 y_2^\beta)^{1/\beta} \quad (1)$$

其中 $\beta \leq 1$, $b_1, b_2 > 0$, 并且 $b_1 + b_2 = 1$ 。最终产品 Y 可以作为最终消费品和中间投入品。每种中间投入品按照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生产,表示为:

$$y_i = k_i^{(1-\alpha_i)} (A_i n_i)^{\alpha_i} \quad i=1,2 \quad (2)$$

其中, $0 < \alpha_i < 1$; k_i 和 n_i 分别代表部门 i 的资本和劳动力; A_i 代表技术水平, 它是关于时间的外生变量。两部门的差异在于生产中劳动份额 α_i 的不同。假定最终产品和中间投入品的产出规模报酬不变, 产品市场完全竞争, 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

2. 要素部门配置

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的最优选择, 其一阶条件为:

$$\frac{p_i y_i}{Y} = s_i = b_i \left(\frac{y_i}{Y} \right)^{(\epsilon-1)/\epsilon} \quad i=1, 2 \quad (3)$$

其中, 最终产品的价格设定为单位价格, p_i 表示中间产品的价格, $\epsilon = (1-\beta)^{-1}$ 代表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方程(3)表明最终产品价值流向各中间部门的份额(s_i)。由于假设最终产品规模报酬不变, 故 $s_1 + s_2 = 1$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 中间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y_i = \frac{\omega n_i}{p_i \alpha_i} = \frac{r k_i}{p_i (1-\alpha_i)} \quad i=1, 2 \quad (4)$$

其中, r 表示利率水平, ω 表示工资率。静态均衡条件包括方程(3)和(4)以及市场出清条件 $k_1 + k_2 = k$, $n_1 + n_2 = n$ 。静态均衡条件决定了每个时点上劳动力和资本的部门间配置问题。

3. 劳动力真实回报变化

根据中间品厂商最优选择一阶条件, 真实工资率变动可以表述为:

$$\hat{\omega} = \hat{p}_1 + \hat{y}_1 - \hat{n}_1 \quad (5)$$

其中, “ $\hat{\cdot}$ ”表示变量变动率(如 $\hat{x} = dx/x$)。方程(5)右边前两项是用最终产品表示的部门 1 的产值变动($p_1 y_1$), 根据方程(1)以及 $\hat{Y} = s_1 \hat{y}_1 + s_2 \hat{y}_2$, 可知:

$$\hat{s}_1 + \hat{Y} = \frac{\epsilon-1}{\epsilon} \hat{y}_1 + \frac{1}{\epsilon} (s_1 \hat{y}_1 + s_2 \hat{y}_2) \quad (6)$$

方程(5)右边最后一项是劳动力的变动率, 利用最终产品和中间品的一阶条件以及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n = n_1 + n_2$, 得:

$$\hat{n}_1 = e_2 \frac{\epsilon-1}{\epsilon} (\hat{y}_1 - \hat{y}_2) + \hat{n} \quad (7)$$

其中, e_2 是部门 2 中的劳动力比重, $e_2 = n_2/n$ 。根据方程(6)和(7), 整理可得真实工资率的增长表达式为:

$$\hat{\omega} = \sum_{i=1}^2 s_i \hat{y}_i + \left(\frac{\epsilon-1}{\epsilon} \right) \sum_{i=1}^2 (e_i - s_i) \hat{y}_i \quad (8)$$

其中, \hat{y}_i 代表各部门增长率。方程(8)表示真实收入增长率与两个部分有关: 第一部分为人均 GDP 增长, 较高人均产出增长会导致工人收入增加, 各部门增长率与其权重一起对工资收入水平变动产生影响; 第二部分与分配效应有关, 分配效应对工资的影响取决于中间品的替代弹性 ϵ 以及部门劳动力密集程度。部门劳动力密集程度可以由部门劳动力比重与部门份额之差($e_i - s_i$)反映。结合方程(3)和(4), 劳动密集度可以表示为:

$$e_i - s_i = \frac{1}{1 + \left(\frac{\alpha_{-i}}{\alpha_i} \right) \left(\frac{s_i}{s_{-i}} \right)} - \frac{1}{1 + \left(\frac{s_i}{s_{-i}} \right)} \quad i=1, 2 \quad (9)$$

其中, α_{-i} 表示 α_i 之外的另一部门, 如果 $i=1$, 那么 α_{-i} 表示部门 α_2 , s_{-i} 也是如此。方程(9)表明, 在生产中劳动份额 α_i 越大的部门, 劳动力份额与产值份额之差越大。这意味着, 只要中间品替代弹性足够大, 一个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产值增加将会给真实工资的提升带来额外效应。贫困者收入与劳动力收入一致的假定意味着, 在保证劳动力供给不变的前提下, 贫困减缓由真实工资的变动决定, 用数学方式可以表示为: $\hat{h} = r_0 + r_1 \hat{\omega}$, 这表明贫困减缓与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密集程度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两者关系可以最终表示为:

$$\hat{h} = r_0 + r_1 \left[\sum_{i=1}^2 s_i \hat{y}_i + \left(\frac{\epsilon - 1}{\epsilon} \right) \sum_{i=1}^2 \frac{\hat{y}_i}{1 + \left(\frac{\alpha_{i-1}}{\alpha_i} \right) \left(\frac{s_i}{s_{i-1}} \right)} - \frac{\hat{y}_i}{1 + \left(\frac{s_i}{s_{i-1}} \right)} \right] \quad (10)$$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推论:

推论一:经济增长是贫困减缓的有效来源,贫困者收入取决于总体经济增长率;

推论二:经济增长的部门构成能够影响贫困减缓,具体表现为三次产业的贫困减缓弹性不同;

推论三:劳动密集程度也能够影响减贫,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程度越高,则贫困者收入提升越快,贫困减缓效果越好。

(二)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理论模型的三个推论,接下来将根据方程(10)构造计量模型。首先,分析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关系,对推论一进行检验,并与同类研究进行比照;其次,将总体经济增长分解为三次产业的经济增长,分析不同产业部门对贫困减缓影响的差异,检验推论二;最后,基于劳动密集度构造经济增长指标,分析劳动密集度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检验推论三,同时与推论二的实证结论进行比照。另外,由于贫困存在跨期相关性,为了规避解释变量遗漏带来的参数估计不一致,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构造动态模型。最终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hat{h}_{rt} = \alpha_0 + \alpha_1 \hat{h}_{rt-1} + \alpha_2 \hat{y}_{rt} + \alpha_3 \hat{y}_{lab} + \sum_{i=1}^3 \delta_i \cdot s_i \hat{y}_i + \beta_j x_{jt} + u_{rt} \quad (11)$$

其中,下标 r 表示省区, t 表示年份; \hat{h} 是被解释变量,即贫困者收入变动率,在实际分析过程中,我们将贫困分解为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其收入变动率分别用 \hat{h}_{urb} 和 \hat{h}_{rur} 表示; \hat{h}_{rt-1} 表示被解释变量的 1 阶滞后项; \hat{y} 表示总体经济增长率; \hat{y}_{lab} 表示根据劳动力密集程度加权后的经济增长率; s_i 表示三次产业部门占总体经济的比重,如 s_2 表示第二产业在总产出中的份额; \hat{y}_i 表示三次产业部门各自的产出变动率; x_j 表示其他 j 个控制变量,包括基础设施情况 ($\ln infra$) 和教育水平 ($\ln expe$); u_{rt} 为综合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为 2000~2010 年西部 12 省区面板数据,其中农村和城市贫困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贫困监测报告》和各省区统计年鉴;人均产值、产值结构、劳动密集度、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分别由《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 2010 年、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到。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贫困状况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将西部地区贫困界定为收入贫困,暂时不考虑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在测度指标选择上,借鉴 Dollar 和 Kraay 以及张萃的做法^[6],从贫困人口收入的角度对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用“各地区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纯收入”反映农村贫困;用按收入等级分的最低 20% 的城镇居民收入反映城市贫困状况。所有货币数据均以 2000 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调整。

2. 解释变量

(1) 经济增长。它用总产出变动率表示,根据理论模型的推论一,经济增长能够通过提升贫困者的收入水平,对贫困减缓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总体经济增长的参数估计预期为正值。

(2) 产业结构。它用三次产业产值比重表示,在实际分析过程中,我们将各产业份额与增长率的乘积 ($s_i \hat{y}_i$) 引入计量模型。根据推论二,三次产业的减贫弹性系数应该不同,即在常用显著性水平上应该能够拒绝原假设: $\delta_1 = \delta_2 = \delta_3$ 。

(3) 劳动密集度加权增长率。它是各部门经济增长与其产值比重以及劳动力密集度的加权值,其计算公式为: $\hat{y}_{lab} = \sum_{i=1}^3 \left(\frac{e_i}{s_i} - 1 \right) \cdot s_i \cdot \hat{y}_i$ 。根据理论模型推论三,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密集程度越高,则

越有利于贫困减缓,因此参数估计预期为正值。

3. 主要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两个控制变量,分别用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和人均教育经费支出表示,在实证分析中两者均取其自然对数。教育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在不同部门、对不同的收入群体存在多种可能,因此教育减贫效应的参数估计符号需要实证检验。基础设施与贫困减缓之间也并非简单关联,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基础设施的类型、新增基础设施的部门等因素,因此该参数估计值符号同样需要通过实证来检验。

四、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 计量方法

由于计量模型设定、数据选择的特殊性,在估计过程中我们面临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动态设定导致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与综合误差项存在相关性,从而引致组内估计量不一致;第二,教育和贫困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并且教育支出可能由贫困状况内生决定,因此需要解决联立内生性问题;第三,本文使用的数据为 $T=11, N=12$ 的面板数据,数据集的时间跨度相对较短,面临小 T 而大 N 的短面板问题。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在分析中使用系统广义矩(SYS-GMM)方法对动态模型进行估计,并在估计过程中将教育支出作为内生变量。系统广义矩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需要假定随机扰动项不存在序列相关,因此在估计中我们分别给出了差分方程的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1)和AR(2)),如果AR(2)检验的 p 值大于常用显著性水平,则表明扰动项不存在序列相关;二是要求新增工具变量有效,我们使用Sargan过度识别检验来验证新增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其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有效。

(二) 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首先对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农村和城镇样本的计量结果见表1中模型一和模型四,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西部城乡贫困减缓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推论一。其次,将总体经济增长分解为三次产业增长,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1中模型二和模型五。结果显示三次产业对城乡贫困减缓的回归系数不同,我们进一步检验了原假设: $\delta_1 = \delta_2 = \delta_3$,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均能在常用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该原假设,从而证实了推论二。最后,我们分析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度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计量结果见表1中模型三和模型六,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度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统计显著,从而验证了推论三。为了进一步表明所使用计量方法的正确性,我们对随机扰动项的序列相关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AR(2)检验和Sargan检验的 p 值均在0.1以上,即残差差分不存在序列相关,模型设定正确,且工具变量有效。接下来,我们将结合理论模型和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表1中的实证结果进行详细分析。

1. 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关系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西部地区贫困者收入提升有正向作用,统计显著,且在农村和城市样本中均保持稳健。该结果与郭熙保、罗知对中国整体的实证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说明经济增长的确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起到了积极作用,经济增长依然是西部地区实现贫困减缓的有效动力来源。但经济增长对农村和城市的减贫弹性有所不同,结果显示城市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为0.373,农村为0.245,经济增长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收入提升更为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城乡要素报酬分配的差异,经济增长转化为贫困者收入需要经过要素分配的转化过程,因此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对不同群体而言是异质的^[7]。有两方面的优势使得城市地区的贫困者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更多:一方面,城市地区贫困者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更高,劳动力投入得到了更有效的使用,而农村贫困者则存在隐性失业现象,无法获得平均回报;另一方面,由于主要经济活动聚集在城市,城市地区贫困者从经济增长中获利所付出的成本低于农村贫困人口,这些额外成本包括生存成本、迁移成本、就业搜寻成本等多种成本^[8]。

2. 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

从经济增长的部门结构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来看,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显著不同。以农村样本为例,三次产业的减贫弹性分别为 1.071、0.005 和 0.602。城市样本中也是第一产业的减贫效果最为显著,其次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的减贫效果最不明显。因此经济增长的部门结构能够影响贫困减缓,并且三次产业部门的减贫效果各有不同。这与李小云、于乐荣、齐顾波及张萃的实证结果一致^{[9][6]}。根据理论模型,这主要与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有关,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密集度更高。另外,三次产业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在农村和城市也有所不同。第一产业对城市贫困减缓的作用大于农村地区,而在农村地区服务业的贫困减缓效应大于城市地区,第二产业在城乡减贫中的作用均不显著。出现该种情况的原因同样与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经济活动的参与成本有关。农村贫困者从事第一产业虽然能够产生显著的贫困减缓作用,但由于农产品本身的属性和运输距离的原因,需要付出额外交易成本,形成漏损。因此,第一产业对城市贫困减缓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农村从事第三产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多数将城镇作为主要居住地,节约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成本,并且由于面临的风险和压力更大,农村贫困者的工作强度高于城市贫困者,从而导致第三产业对农村减贫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发展第一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是有效的减贫路径,并且着力降低贫困者参与经济活动的成本对提升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意义重大。

3. 劳动密集度与贫困减缓的关系

Seetanah 认为不同产业部门减贫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三部门构成仅仅是影响贫困减缓的一个外在渠道,还应找到更为深入的机制和影响渠道^[10]。基于理论模型,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密集程度是经济构成影响贫困减缓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也表明,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程度对贫困减缓呈正向作用,并且该结果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保持稳健,从而证实了推论三。这表明西部地区未来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动力来源于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吸纳能力更强、对本地贫困群体更为包容的经济增长方式更有利于贫困减缓的实现。因此,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劳动力最大程度利用,规避第一产业的冗余就业,实现劳动力转移是未来完成可持续减贫的重点所在。

表 1 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与西部城乡贫困减缓

	农村贫困			城市贫困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hat{h}_{t-1}	-0.431*** (0.067)	-0.313 (0.039)	-0.321** (0.134)	-0.512*** (0.104)	-0.358 (0.169)	-0.471*** (0.110)
\hat{y}	0.245*** (0.060)			0.373*** (0.133)		
$s_1\hat{y}_1$		1.071** (0.431)			1.597 (1.000)	
$s_2\hat{y}_2$		0.005 (0.132)			-0.083 (0.231)	
$s_3\hat{y}_3$		0.602 (0.418)			0.295 (0.939)	
\hat{y}_{lab}		0.019** (0.009)	0.061*** (0.005)			0.060*** (0.011)
ln infra	0.009 (0.009)	0.025* (0.015)	0.004 (0.016)	-0.021 (0.036)	-0.034 (0.033)	-0.010 (0.030)
ln expe	0.026*** (0.008)	0.027** (0.012)	0.040** (0.013)	0.069*** (0.029)	0.088*** (0.034)	0.058** (0.029)
cons	-0.077 (0.058)	-0.084 (0.107)	-0.148 (0.106)	-0.397* (0.231)	-0.525** (0.267)	-0.270 (0.230)
观测数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AR(1)检验 p 值	0.060	0.149	0.090	0.284	0.247	0.248
AR(2)检验 p 值	0.485	0.567	0.972	0.285	0.697	0.227
Sargan 检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4. 其他解释变量与贫困减缓的关系

贫困的一阶滞后项系数为负值,表明上年减贫速度快的地区在当期减贫速度将有所减缓,即贫困减缓存在收敛性,同时表明西部地区的贫困减缓难度会越来越大。随着贫困深度较低的群体快速脱贫,剩余贫困者存在陷入慢性贫困的可能。未来西部地区的贫困减缓,应选择盯住慢性贫困人群的策略。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对贫困减缓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提高西部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改善人力资本构成是实现持续减贫的重要途径。但基础设施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无论是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均不显著(模型二除外),主要原因在于西部慢性贫困人口的生产要素和资本都较为匮乏,基础设施尚未纳入其收入函数,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与变量选择有关,不同的基础设施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有所不同,这也是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五、结论性述评

与全国整体相比,西部地区面临的贫困减缓形势更为严峻,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减贫效应趋于减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西部地区持续性的贫困减缓是其面临的重要难题,这关乎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本文从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角度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

第一,经济增长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保持稳健,但经济增长的贫困减缓效应存在城乡差异,经济增长对城市贫困减缓的作用要大于农村地区,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贫困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更高,且就业成本相对较低。第二,经济增长的部门结构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减贫效果最为显著,第二产业的减贫效果最弱,劳动力密集程度的差异是部门结构减贫效应不同的主要原因。第三,劳动力密集度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减贫弹性在城市和农村均为0.06。另外,西部地区贫困减缓存在收敛性,贫困人口存在陷入慢性贫困陷阱的可能,并且研究结论还显示教育水平提升是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可靠选择,但基础设施的减贫作用并不明显。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为:西部地区要实现可持续贫困减缓,提高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其关键在于一方面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要重视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劳动力吸纳能力更强、对本地贫困群体更为包容的经济增长方式更有利于贫困减缓的实现^[11]。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契合本地资源禀赋,着力促进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其他非农产业的转移,实现第一产业冗余就业的有效利用。此外,着力提高西部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并且降低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成本,减少产出向贫困者收入转化的漏损是实现持续减贫的可靠选择。

参考文献:

- [1] Montalvo, J. G., Ravallion, M. The Pattern of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0, 38(1): 2-16.
- [2] Fosu, A. K. Inequality and the Impact of Growth on Poverty: Comparative Evidence for Sub-Saharan Afric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9, 45(5): 726-745.
- [3] Thorbecke, E., Jung, H. S. A Multiplier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Analyze Poverty Allevi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 48(2): 279-300.
- [4] Ravallion, M., Chen, H. S.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2(1): 1-42.
- [5] Hasan, R., Quibria, M. G. Industry Matters for Poverty: A Critique of Agricultural Fundamentalism[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ocial Sciences, 2004, 57(2): 253-264.
- [6] 张萃. 中国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基于产业构成视角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5): 51-62.
- [7] 李石新, 郑娟. 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实证分析[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 91-95.
- [8] 江曼琦, 翁羽. 少数民族迁移就业的成本和收益与城市民族工作的开展[J]. 云南社会科学, 2010, (1): 26-29.
- [9] 李小云, 于乐荣, 齐顺波. 2000-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作用: 一个全国和分区域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 (4): 4-11.
- [10] Seetanah, B., Rojidi, S., Shalini, R. Sectoral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Dynamic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2008, 8(3): 24-43.
- [11] 蔡向东. 包容性增长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构建[J]. 江汉论坛, 2011, (6): 45-48.

(责任编辑:胡浩志)